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2008—2011)

杨原◎

【内容提要】 本文以中国 11 种国际关系学期刊 2008—2011 年所发表的理论研究类论文为样本,对最近四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回顾。统计结果显示,过去四年,中国理论研究的范式取向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尽管传统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依然是相对关注最多的范式,但没有任何一种范式居于主导地位。实证主义认识论为绝大多数研究理论问题的中国学者所接受或支持,但仍然只有极少数学者能熟练地驾驭统计分析和形式模型等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理论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相对而言,古代中国思想与东亚历史经验等 11 个议题最受中国学者的关注。理论创新的整体水平与过去相比未能有明显的提升,但涌现了不少具有相当水准的创新成果,特别是出现了宏观层次的原创性理论。敏锐的问题意识、广博的知识视野、扎实的逻辑和实证能力,是那些原创性理论研究共有的特点。不过,创新成果毕竟仍只占过去四年中国理论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创新乏力,固然源于研究方法薄弱、问题意识欠缺等痼疾,但也与中国学者实干精神的缺乏以及相互交流不足密切相关。

【关键词】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范式 认识论 方法论 议题 创新不足

《国际政治科学》2012/2 (总第 30 期),第 62—106 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增长知识，在于通过创造系统性的理论来帮助人类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没有理论、有没有好的理论、有多少好的理论，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① 对于起步较晚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而言，理论研究对于整个学科发展的意义更是如此。在过去的十余年间，诸多学者都曾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及学科整体发展状况进行过调查和评估，^② 较为全面地反映了2008年以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下简称“中国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③ 时至今日，中国的理论研究究竟有了多大程度的变化和发展，是我们现在所关心的问题。具体说来，经过30余年的积累，特别是近十余年理论学习的深化，当今的中国理论研究在范式、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是否已经取得某种共识，抑或仍存在某些争论？此外，近年来中国理论研究的主要议

① 李巍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进步”与“问题缺失”——兼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9期，第25页。

② 秦亚青 《国际关系学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载秦亚青 《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272页；孙学峰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现状分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3—9页；门洪华 《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评估报告》，《欧洲》2002年第3期，第90—195页；孙学峰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骨干力量与流派分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第26—28页；王缉思 《当今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成就、趋势和局限》，提交给福特基金会的报告，2003年；王逸舟主编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周桂银 《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议题和问题：基于CSSCI的分析（2001—2005）》，《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年第4期，第86—95页；《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 《2006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综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5期，第68—79页；《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 《2007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报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3期，第65—79页；秦亚青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13—23页；王军、但兴悟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苏长和 《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现状和发展》，《国际展望》2009年第2期，第47—55页。除了对理论及学科整体状况的调查外，也有对具体理论研究状况的评估，如杨广：《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欧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40—150页；薛力、肖欢容 《中国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成就与不足（1998—2004）》，《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第40—48页；高尚涛 《中国合作治理理论研究现状》，《国际观察》2008年第2期，第67—73页；杨原 《中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现状分析（2001—2007）》，《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年第3期，第58—67页。

③ 根据笔者的检索，尚未发现针对2008年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系统性评述文章。

题有哪些,涌现了哪些创新成果,同时尚存在哪些不足?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调查和梳理,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并希望通过总结近年来中国理论研究的经验和教训,为今后有志于继续投身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同仁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本文以下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研究方法和样本的选择标准。第二部分以所选样本为对象,考察过去四年中国理论研究中的范式、认识论和方法论情况,并对四年来中国学者有关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做出简要回顾。第三部分重点分析目前中国理论研究的主要议题,梳理重要的创新成果,总结创新经验,并指出目前中国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最后是对全文评述的总结。

一、样本的选择

为了对最近四年中国理论研究的总体情况进行系统性的把握,我们选择以2008—2011年在中国11种国际关系学期刊上发表的理论研究型论文为样本,以此分析这一时期中国理论研究的相关特点。这11种期刊分别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美国研究》、《欧洲研究》、《国际政治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国际观察》、《当代亚太》、《外交评论》、《国际问题研究》、《国际论坛》和《国际政治科学》。其中前10种期刊都是2010—2011年《CSSCI来源期刊目录》和2008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排名靠前的国际政治类期刊,^①《国际政治科学》是国内最先严格实行匿名评审的国际关系学期刊。^②这11种期刊所刊发的论文基本代表了近年

^① 南京大学中国社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0—2011年)来源期刊目录》,http://cssci.nju.edu.cn/news_show.asp?Articleid=163;朱强等主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所做的全部两次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调研报告中,均将《国际政治科学》列为统计来源期刊。见《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2006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综述》,第69页;《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2007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报告》,第65页。

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最高水平。

之所以选择期刊论文而不选择其他形式的研究成果作为统计分析的样本，主要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首先，大多数新近出版的学术专著，其基本观点、研究框架和主要论证过程都会首先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其次，与书籍出版的评审过程相比，目前大多数期刊的同行评审过程都要更为严格，也更富有学术水平，以这种形式筛选发表的研究成果更能准确地反映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真实水平；最后，通过对既定时间范围内既定期刊中发表的论文进行统计，所得出的数据更具系统性，能够较好地避免调查者主观偏好所带来的选择偏差。^①

当然，统计样本所反映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理论研究的整体概况。而当笔者评析代表性的创新成果时，分析对象将不局限于所选样本。这样做并不影响我们对总体状况的判断，同时也能避免遗漏掉少数重要但未在上述11种期刊上发表的成果。同时，在分析过程中笔者还将比对中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结论，做出纵向或横向上的比较，以期更加准确地评估中国理论研究的现状。

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大类。^② 本文考察的是前者在中国过去四年的发展状况，因此我们只选择理论研究型论文作为分析对象。以往对理论研究的评估性文章，对“理论研究”的界定要么太窄，只包括宏观层次的理论；^③ 要么界定又太过宽泛或笼统。^④ 本文尝试给出一套宽窄恰当且具可操作性的遴选标准。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首先对什么是“理论”和“理论研究”做出准确的界定。尽管对“理论”这个概念做出明确且被一致接受的定义是

^① Daniel Maliniak, Amy Oakes, Susan Peterson and Michael J. Tierne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US Acade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 No. 55, 2011, p. 438.

^② 孙学峰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现状分析》，第4页；薛力、肖欢容 《中国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成就与不足（1998—2004）》，第41页。

^③ 如秦亚青 《国际关系学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第265页。

^④ 如秦亚青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第14页 《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 《2006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综述》，第72页。

困难的,^①但我们仍然能够从多种看法中归纳出一定的共识。

科学哲学家认为,理论不限于对特殊现象做出的解释,而是通过少数假设对纷繁的现象做出的说明(explanation)。^②社会科学家认为,理论是主导探寻各种稳定的关系的指导原则,它应该对产生于各孤立观察的许多问题提供一般性的解释。^③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来说,对“理论”最著名的定义莫过于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N. Waltz)所给出的“理论是对规律的解释”。^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也对“理论”和“理论研究”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例如,李少军就将国际关系理论定义为对国际互动事实的系统解释,其形式是一组相互联系的概念和命题。^⑤秦亚青认为,理论研究是指提出和发展可以合理解释大量客观事实现象的理论。理论研究旨在发现通则,目的是建立由逻辑上相互关联的、涉及经验关系的表述组成的国际关系学理体系。^⑥孙学峰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指通过科学实践,运用具有逻辑性和系统性的方法对客观国际关系现象进行概括性解释的活动。^⑦高尚涛认为,理论研究主要是指提出通则性假设,一般不涉及理论的应用分析和具体的现实问题分析。^⑧

尽管学者们对“理论”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共

① 在2011年12月10日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最新进展与发展趋势(2011)”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曾在“理论”的定义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争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者们对“理论”以及“理论研究”的理解尚存在较大的差异。

② 亚历克斯·罗森堡《科学哲学:当代进阶教程》(刘华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92页。

③ 斯坦因·U. 拉尔森主编《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任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④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5.

⑤ 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与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2期,第42页;李少军《事实与理论: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哲学反思》,《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第57页。

⑥ 秦亚青《国际关系学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第257页。

⑦ 孙学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骨干力量与流派分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第26页。

⑧ 高尚涛《中国合作治理理论研究现状》,《国际观察》2008年第2期,第68页。

通之处,那就是理论应该是一种超越具体经验事实的一般性的陈述,它所说明或者解释的对象不应仅限于某一个特定的经验现象。自然地,这种共识就是本文遴选理论研究型论文的原则。本文所说的“理论”,既包括了诸如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这样的宏观层次的理论,也包括了诸如均势理论、民主和平论这样的中层理论,还包括了诸如联盟信任生成的机制、货币国际化的路径这样涉及具体议题的微观理论。具体说来,本文选择如下类型的论文:

- (1) 对理论或理论思想的梳理。^①
- (2) 本体论、认识论、科学哲学等哲学层次的探讨。^②
- (3) 对理论概念的探讨。^③
- (4) 对理论性著作的评论。^④
- (5) 对中国或其他国家(地区)的理论研究的回顾或综述。^⑤
- (6) 在经验归纳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假说。^⑥
- (7) 在批判或继承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假说。^⑦

① 如李巍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演进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第68—80页;朱中博、周云亨 《老子的大战略思想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2期,第156—167页。

② 如宣兴章 《国际关系是关系:对存在的反思与重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第17—26页;黄海涛 《国际关系理论合成问题浅析》,《外交评论》2008年第3期,第98—103页。

③ 如李少军 《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是什么》,《欧洲研究》2011年第2期,第1—14页;刘丰 《大国制衡行为的概念辨析》,《国际论坛》2010年第1期,第46—50页。

④ 如门洪华 《探究国际秩序建构的逻辑——〈大战胜利之后〉述评》,《美国研究》2008年第3期,第139—146页;邓子立 《国际关系的社会心理学——评〈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2期,第146—160页。

⑤ 如秦亚青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熊炜 《德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借鉴、创新与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7期,第52—58页。

⑥ 如高程 《区域合作模式形成的历史根源和政治逻辑——以欧洲和美洲为分析样本》,《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0期,第33—57页;夏路 《分裂国家统一模式的比较研究——复合权力结构的视角》,《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第104—117页。

⑦ 如唐世平 《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第5—31页;阎学通 《国际领导与国际规范的演化》,《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第1—28页。

(8) 对新理论假说的实证研究。^①

同时,为了更加明确样本选择的边界,我们规定不选择以下类型的论文:

- (1) 对已有理论的运用。^②
- (2) 对某领域经验事实或历史进程的归纳和描述。^③
- (3) 对某一经验困惑的具体解释。^④
- (4) 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专门性研究。^⑤
- (5) 对非理论性著作的评论。^⑥

当然,会议综述、会议发言、学术随笔、书讯等非论文性文章也不在选择之列。此外,四年来关于方法论的论文将被单独收集,并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专门予以讨论。

① 对理论假设的实证性检验,和运用理论(假说)解释经验困惑,这两者中我们认为前者属于理论研究,后者则属于对理论的实际运用,不属于理论研究。对于那些同样诉诸经验困惑的论文,判断其究竟属于理论研究还是属于经验研究,根本上还是应遵循“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具体说来,一是看论文的假设是否是一般性的陈述,二是看论文的最终目的究竟是要通过经验困惑而升华出一个可以超越该案例本身的一般性的结论或解释,还是只是对该案例本身求得解释。这一类论文如邝艳湘《经济相互依赖、退出成本与国家间冲突升级——基于动态博弈模型的理论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第123—138页;李江春:《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悲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1期,第99—123页。

② 如范勇鹏《欧洲认同的形成——一个新制度主义的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2期,第48—59页;宋伟《美国霸权和东亚一体化:一种新现实主义的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2期,第57—66页。

③ 如杜旻《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进程:以中国减贫治理为例》,《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第90—99页;夏莉萍《美国签证审核机制改革评析》,《外交评论》2011年第1期,第128—140页。

④ 如王玉主《“要约一回应”机制与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0期,第53—72页;何韵、史志钦《英国军备出口的决定因素》,《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2期,第40—72页。

⑤ 如夏立平《奥巴马政府的台海政策及其影响》,《美国研究》2011年第2期,第81—94页;沈宏《巴基斯坦的战略选择与战略困境》,《外交评论》2011年第5期,第39—48页。

⑥ 如曾令良《一部通用于中国—欧盟关系领域的杰作——评F.斯奈德编著的〈欧洲联盟与中国,1949—2008:基本文件与评注〉》,《欧洲研究》2009年第4期,第137—141页;魏光启:《美国大战略的浮动性和适度性——读〈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美国研究》2011年第2期,第143—152页。

根据上述标准,笔者共收集到理论研究型论文 463 篇。它们的分布如表 1 所示。^①

表 1 2008—2011 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样本分布

单位: 篇, %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小计	占样本总数的比例
《世界经济与政治》	26	33	42	31	132	28.5
《美国研究》	2	0	1	0	3	0.6
《欧洲研究》	1	5	7	5	18	3.9
《国际政治研究》	13	13	9	11	46	9.9
《现代国际关系》	2	4	2	2	10	2.2
《国际观察》	17	15	10	11	53	11.4
《当代亚太》	2	4	7	8	21	4.5
《外交评论》	20	21	11	14	66	14.3
《国际问题研究》	1	1	1	3	6	1.3
《国际论坛》	15	12	11	8	46	9.9
《国际政治科学》	16	17	14	15	62	13.4
小 计	115	125	115	108	463	100

二、范式、认识论和方法论

范式、认识论和方法论是研究理论的基础和工具,同时也反映着一个国家某学科理论研究的特点、水平和发展方向。以往学者们在回顾中国理论研究时大多只关注研究议题和创新情况,却普遍忽视了范式和认识论这样更为内在的考察角度。相比之下,国外学者从这些角度对学科发展的评估已经做得非常系统。在本部分,笔者将根据统计的样本考察当前中国理论研究的范式、认识论和方法论情况,并与美国的情况进行横向的比较。

^① 受发表日期的限制,《欧洲研究》、《国际政治研究》两份期刊未统计 2011 年最后一期。不过这并不会对统计结果产生实质上的影响。

(一) 当前中国理论研究的范式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史往往被描述为三次或四次范式间的论战史。^①在许多学者心目中,国际关系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由几个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所定义的学科。^②由此可见范式对于国际关系学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巨大影响力。然而,自1999年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出版之后,^③国际关系学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公认的新的理论范式。^④随着对主流理论范式的引进、评介工作逐渐完成,时至今日,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中,是否还存在着主导性的理论范式,是一个有待实证调查的问题。

在此前对中国理论研究的回顾和梳理中,不同的学者对中国的主导范式问题有着不同的判断。例如,孙学峰通过对1995—2001年中国主要期刊的统计,认为“现实主义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导流派”。^⑤薛力和肖欢容也认为,“在中国国关学界,学者一般都有意无意地用现实主义视野分析问题”。^⑥而苏长和则认为,“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

① 秦亚青《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7期,第56—63页;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Nobuo Okawara, “Japan, Asian-Pacific Security, and the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3, 2002, p. 154; quoted from Daniel Maliniak, Amy Oakes, Susan Peterson and Michael J. Tierne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US Academy,” p. 441.

③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④ 有学者认为建构主义并不是一种如同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那种意义上的范式,它甚至事实上可以与这些范式相容。Ole Wæver, “The Sociology of a Not So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 American and European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pp. 687 - 727; J.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pp. 325 - 342; quoted from Daniel Maliniak, Amy Oakes, Susan Peterson and Michael J. Tierne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US Academy,” p. 441. 但是建构主义范式作为国际关系学中的一个特定概念,已经成为现实主义等传统范式的一种替代性分析框架,并被学界所广泛接受和使用。

⑤ 孙学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骨干力量与流派分野》,第26页。

⑥ 薛力、肖欢容《中国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成就与不足(1998—2004)》,第47页。

论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占有主导性地位”。^①然而，笔者的统计结果却显示，至少在过去四年中，中国的理论研究并不存在任何主导型的范式。^②

我们把那些以权力或实力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或者以现实主义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划归入现实主义范式；把那些以国际制度、相互依赖、国内政治等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或者以自由主义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划归入自由主义范式；把那些以观念、认同、规范以及社会互动作为核心分析变量或者以建构主义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化归入建构主义范式；把那些以阶级、经济关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或者以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划归入马克思主义范式；把那些以国际社会作为核心分析变量或者以英国学派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划归入英国学派；而那些无法划归入上述几种范式的论文划归入“无范式研究”的范畴。^③

依据这一标准，在总共 463 个样本中，运用或研究现实主义范式的论文共 57 篇，占样本总数的 12.3%。运用或研究自由主义的论文共 65 篇，占样本总数的 14.0%。运用或研究建构主义的论文共 45 篇，占样本总数的 9.7%。运用或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英国学派的论文分别为 7 篇和 8 篇，分别占样本总数的 1.5% 和 1.7%。而有 60.7% 的论文没有明确的理论范式。这些数据显示，尽管相比较于马克思主义和英国学派而言，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在中国理论研究领域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的理论研究并不存在任何主导性的理论范式。超过六成的理论研究成果，没有明确遵循这五种范式所设定的分析视角和解释框架，或者并不以这五种范式本身作为研究对象。

① 苏长和 《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现状和发展》，《国际展望》2009 年第 2 期，第 48 页。

② 本文的调查对象不包括经验和政策研究，因此有可能在经验和政策研究领域，中国仍然存在某种主导性的研究范式。

③ 综合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范式，亦即同时运用不同范式的核心解释变量的文章视为无范式类文章。

丹尼尔·马林尼亚克 (Daniel Maliniak) 等学者最近抽样调查了 1980 年至 2007 年美国学者在 12 份顶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就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在范式、认识论以及方法论方面的多元化程度问题进行了统计分析。我们不妨将中国理论研究的相关统计结果与其作一个粗略的比较。根据丹尼尔·马林尼亚克等学者的调查,2006 年美国无范式型论文占当年样本总数的比例同样超过了 60%,理论的多元化特点十分突出。^①由此可见,在不存在主导性理论范式这一点上,中国的理论与美国的情况十分相似。这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与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已有理论范式太多的影响和束缚。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理论探索的多元化有利于塑造学者们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同时使得不同的理论思想都能在相互碰撞中接受检验、批判和完善。

(二) 当前中国理论研究学者的认识论

对于学术共同体的理论建设来说,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学者在从事理论研究的过程中都坚持何种认识论?换言之,在他们看来,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怎样的,需要遵循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对其进行认识和把握?如何才能确定所获得的认识是正确的和可靠的?认识论既与本体论密切相关,同时又直接指导着方法论的选择,对一个学者乃至一个学科的理论建设无疑都具有重大的影响。

为了简便起见,同时也为了便于进行横向的比较,我们将中国理论研究的认识论分为实证主义和非/后实证主义两类。具体而言,那些坚持实证主义认识论的论文,应该明确或隐含地假定它所提出的理论或经验命题是可以通过经验证据加以验证的,并且愿意运用符合科学标准的方法,同时寻求因果解释或预测。除此之外,对于那些没有明确使用科学方法的论

^① Daniel Maliniak, Amy Oakes, Susan Peterson and Michael J. Tierne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US Academy," pp. 445 - 446.

文,如果存在以下情况中的一种或几种,我们也将其划归入实证主义认识论的范畴:(1) 文章的作者用科学和实证的原则来评价其他研究的有效性;(2) 作者支持或者捍卫那些与实证主义相一致的社会科学概念;(3) 作者对那些致力于科学和实证研究的成果持肯定态度并且不对其研究过程和研究手段提出质疑。^①而那些不符合上述标准的论文,则被划归入非/后实证主义认识论的范畴。

依据上述标准,在总共 463 个样本中,认识论属实证主义的论文共 398 篇,占样本总数的 86.0%。而属非/后实证主义的论文仅 65 篇,仅占样本总数的 14.0%。曾有学者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存在的学术人文化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②但上述数据却表明,至少在最近四年中,中国从事理论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在如何看待和认识国际关系这一问题上,彼此之间已经达成了较高程度的共识,绝大多数学者都明确或隐含地承认,他们所阐述或评析的理论观点是可以通过经验事实来进行检验的。^③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中国理论研究领域存在科学派和人文派的分野,^④但至少在认识论这一领域,也是科学派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根据丹尼尔·马林尼亚克等学者的统计,美国 2006 年坚持实证主义认识论的论文占当年样本总数的比例同样达到了接近 90% 的水平。^⑤这意味着,与理论范式的情况一样,中美两国学界在认识论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共同的特点,两国学界目前都很少在如何看待和认识国际关系这一问题上存在争议。

① 判断标准参见 Daniel Maliniak, Amy Oakes, Susan Peterson and Michael J. Tierne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US Academy," p. 455. 笔者作了适当修改。

② 张睿壮 《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5 期,第 71 页。

③ 鲁鹏曾撰文讨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共识问题。他认为共识之一就是:中国学者普遍相信,理论的创建和衡量过程必然受到经验事实的影响。鲁鹏 《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共识及其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12 期,第 103 页。本文的统计结果基本支持了这种判断。

④ 李巍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进步”与“问题缺失”》,第 28—29 页。

⑤ 事实上,大约自 1991 年开始,美国坚持实证主义认识论的论文占各年样本总数的比例就已经稳定地保持在 80% 以上。Daniel Maliniak, Amy Oakes, Susan Peterson and Michael J. Tierne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US Academy," p. 455.

(三) 当前中国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及其讨论

研究方法的落后是中国国际关系学长期以来的软肋,早已为诸多学者所诟病。^① 为了确证这种看法,我们不妨以最近四年中国理论研究的样本再作一次统计。笔者参考漆海霞的分类方法,^② 将研究方法分为文本解读和梳理、逻辑思辨、历史描述、案例研究、形式模型和统计分析六类。其中,历史描述和案例研究的区别在于其目的是还原事实本身还是揭示因果规律;统计分析特指推断统计方法,因而那些仅使用了描述统计数据的论文不被视为使用了统计分析方法。

统计结果显示,文本解读和梳理是当前中国理论研究最为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在全部 463 个样本中,使用文本解读方法的论文达到 294 篇,占全部样本的 63.5%。其次是历史描述方法,共有 100 篇论文,占样本总数的 21.6%。使用案例研究方法的论文共 58 篇,占样本总数的 12.5%。使用统计分析和形式模型方法的论文最少,均为 5 篇,均仅占样本总数的 1.1%。而根据丹尼尔·马林尼亚克等学者的统计,统计分析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使用最多的研究方法。2006 年美国使用统计分析的论文占到当年样本总数的 53%。其次是案例研究方法。统计分析和案例研究方法加起来超过全部文章的 80%。^③ 也就是说,美国学者最常使用的方法,恰好是中国学者使用最少的方法;而中国学者最常使用的方法,恰好又是美国学者使用最少的方法。

中国理论研究在理论范式和认识论两个方面和美国的情况都十分接

① 孙学峰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现状分析》,第 7 页; 门洪华 《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评估报告》,第 97 页; 李巍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进步”与“问题缺失”》,第 26—27 页; 张睿壮 《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第 71 页。

② 漆海霞 《国际关系学科中研究方法的应用分野——对 2005—2009 年〈国际组织〉杂志的数据分析》,《外交评论》2011 年第 5 期,第 143 页。

③ Daniel Maliniak, Amy Oakes, Susan Peterson and Michael J. Tierne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US Academy,” pp. 451–452. 根据漆海霞的统计,《国际组织》2005—2009 年所发文章中,运用最多的研究方法同样是统计分析和案例研究。见漆海霞 《国际关系学科中研究方法的应用分野》,第 143—144 页。

近，而唯独在方法论方面，中美两国的情况截然相反。通过这样一个对比，越发凸显出中国理论研究的症结所在，那就是研究方法上的落后。大多数研究理论问题的中国学者，还不能熟练地使用推断统计、形式模型和受控案例这些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最常用的方法仍然是文本梳理和解读，而这正是中国理论研究中梳理性文章泛滥、创新性成果匮乏的重要原因。

中国绝大部分研究理论的学者都认同实证主义认识论，但只有非常有限的中国学者使用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研究方法。这一现象说明，中国国际关系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落后，其症结并不在于中国学者真的在科学哲学层面上反对实证主义和科学方法^①，而只在于他们对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不熟悉、未掌握。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坦言：“相当多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并没有进行系统的方法论的训练，使得很多学者不是不愿意进行具体的实证研究，而是不能进行。”^②有鉴于此，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水平以及理论研究的水平要想有尽快的提高，应该减少哲学层次的讨论和争论，而将节省出的精力和资源投在具体研究方法的普及教育和扎实训练上。

尽管近四年来中国学者在研究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方面与此前相比并未取得明显的进步，但出现了不少关于方法论的专门性研究和讨论^③，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学者已经逐渐认识到研究方法的意义，方法论问题开始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研究的一个议题。^④鉴于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以及其在中国的现状，我们有必要在此对近年来中国学者有关方法论

① 这一点是就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整体而言。在中国，真正从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不接受实证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当然是有的。只不过，基于本文的统计数据，这些学者只是少数。

② 何忠义《中国的安全问题研究》，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第423页。

③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学界不仅关注方法论的研究增多，而且出现了讨论认识论的成果。见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事实与观察》，《国际观察》2008年第1期，第1—8页；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途径与范式》，《欧洲研究》2008年第1期，第113—124页。

④ 当然，对这个议题予以关注的学者还不多，更远未形成独立的小学科。见漆海霞、周方银、阎学通《定量分析的前景》，《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3期，第125页。

的讨论予以简要的回顾。

尽管大部分学者都接受实证主义认识论,但仍然有学者对以此为基础的科学方法论继续持批判态度。许亮认为,方法论应由本体论和认识论决定。国际关系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行为体的行为都是在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人的观念的客观规律。既然如此,以物质主义本体论为基础的科学主义方法论就不能完全适用于具有观念本体的国际关系研究。^①同样是对科学方法提出质疑,华翔则认为,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最大困难在于其难以保证认识的客观性。在他看来,实证主义方法论只提供了当一种观点被提出以后应该如何对其加以论证的方法,却并没有提供如何提出该观点的方法,因此这种方法论只能保证文章形式的客观性,但不可能保证实质的客观性。^②除此之外,《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2010年还刊登了英国学者台乐怡(Ian C. Taylor)的一篇批判主义色彩浓厚的文章。这篇文章否认识识的价值中立和科学研究的客观性,主张用反思主义研究方法取代实证主义研究方法。^③

当然,更多的学者已经从哲学层面的讨论转向了基于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具体研究方法的讨论。秦亚青2008年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进行研究设计以实现学术创新的文章。该文以规范传播为主题的创新性研究成果为例,详细剖析了其研究设计和研究过程,展示了工巧的研究设计、恰当的研究方法对于学术创新的重要意义,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秦亚青在文中还批评了当前在中国学界出现的两个误区。其一是认为文献梳理越详尽越好。秦亚青认为,好的文献回顾应该具备针对性、相关性和学术性,穷尽所有文献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其二是认为研究方法越复杂、越尖端越好。但实际上,方法是工具,是为研究思

① 许亮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科学主义陷阱》,《国际论坛》2008年第5期,第49—55页。

② 华翔 《国际关系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思想演变:从“物质”到“观念”》,《国际论坛》2010年第4期,第55—59页。

③ 台乐怡 《与权力做斗争——拒绝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实证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2期,第133—142页。

想和研究设计服务的。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取决于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目的，而不应本末倒置。^①

李少军对案例研究这一国际关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分析。他认为，案例研究可以分为非理论性案例研究和理论性案例研究两大类。其中，理论性案例研究的主要作用是检验和发展理论。相比较于统计方法，案例研究对理论的证伪作用强于它的证实作用；而启发性案例研究和反常案例研究则可以帮助人们发展新理论。尽管案例研究所得结论在普遍性上广受质疑，但研究者仍然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增强其普遍意义。例如用一个“最有可能的案例”证明假设不成立，或者用一个“最不可能的案例”证明假设成立。而对某个案例进行内部分析时，过程追踪、相合性检验和反事实分析是研究者最常使用的三种手段。^② 针对过程追踪这一案例分析最为重要的手段，曲博予以了专门的讨论。他指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过程追踪法由于承担着理论验证的任务，因此首先应当在理论假设的指导下选择案例，进而根据假设推出尽可能多的可供观察的中间步骤，以此观察经验事实以验证因果作用机制是否存在。^③

在定量方法的探究方面，针对如何有效地利用现有数据库来为定量研究服务这一问题，刘丰和陈冲对国际冲突、国际经济地理、国际组织及调查等领域的重要数据库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详尽介绍了各数据库的内容、来源和特点。除此之外，他们还总结了搜寻现有数据的基本方法，其中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从相关领域的学术文献中寻找数据来源线索，此外还可以通过研究者的个人主页、发表文章的期刊官方网站等途径查找。刘丰和陈冲特别强调，在同一主题下可能存在多种数据库，其数据的结构、赋值、收集过程不尽相同，研究者应该依据自己的研究问题谨慎选择恰当的数据库。^④ 漆

① 秦亚青 《研究设计与学术创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8期，第75—80页。

② 李少军 《论国际关系中的案例研究法》，《当代亚太》2008年第3期，第111—123页。

③ 曲博 《因果机制与过程追踪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第97—108页。

④ 刘丰、陈冲 《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5期，第18—41页。

海霞对如何使用量化方法进行国际关系预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她借鉴计量经济学已有的成果,将时间序列方法引入国际关系领域,以中法关系为例,通过建立差分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 (ARIMA),对短期内的中法关系进行了预测,并借此展示了运用时间序列模型预测双边关系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时间序列方法这种高级计量方法的引进,有助于丰富我们定量预测国际关系事件的技术手段。^①

此外,漆海霞还以《国际组织》上发表的4篇论文为例,分析比较了思辨分析、形式模型、统计分析和案例研究四种研究方法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其中,思辨分析的选题有较大的自由空间,更容易找到理论前沿,但证明的严谨性和可靠性不及其他三种方法。形式模型的优势在于其逻辑的严密性,但由于受先验参数影响较大,因此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假定。统计分析相比较于案例研究最大的优势在于其能有效避免选择偏误的问题,能够根据数据对假设给予系统的检验,但它只能验证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而难以确定因果关系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同时统计分析的应用还受到数据可获得性的制约。而案例研究的优势和劣势在很大程度上恰好与统计分析相反。案例研究有助于验证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但难以保证结论的普遍性。^② 这项比较研究有助于学者更好地把握不同研究方法的长处和短处,在研究实战中恰当灵活地加以选择使用。

中国学界关注方法论问题的学者日益增多,关于方法的研究成果也日趋丰富,这固然反映出中国学界对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加深,但正如秦亚青所指出的:方法的本质是工具^③。再精致巧妙的方法,其价值也只有在被广泛使用中才能得到体现;如果只是研究、只是讨论而不实际运用,再高超精彩的方法论研究也将失去意义。在方法掌握和运用的水平仍然很低的情况下,我们衷心地希望,包括上述关注方法论的学者在内的中国国际关

① 漆海霞 《时间序列分析在国际关系预测中的应用——以中法关系为例》,《欧洲研究》2009年第4期,第20—32页。

② 漆海霞 《国际关系学科中研究方法的应用分野》,第146—154页。

③ 秦亚青 《研究设计与学术创新》,第77页。

系学术共同体,不仅积极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而且能够学为所用,在研究实战中利用科学方法这个利器,去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上的难题。

三、议题、创新与不足

考察了近四年来中国理论研究在范式、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现状后,我们需要更进一步了解这四年中国理论研究的具體内容。具体包括:这四年研究的主要议题有哪些,涌现出哪些创新性成果,存在哪些不足。

(一) 主要议题

从本文统计的463个样本来看,过去四年中国理论研究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其中,有11个议题的论文数超过了10篇,总数达194篇,超过了样本总数的40%。可将这11个议题视为当前中国理论研究的主要议题。^①这11个主要议题的发文数量及其在各期刊的分布,如表2所示。

在这11个主要议题中,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国际规范、同盟理论、规范性理论和战争相关问题这5个议题属于传统的研究议题,基本涵盖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研究领域。另一个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则属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正在探索和发展的重点领域。^②相比较而言,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和语言、国内政治与国家行为这两个议题则属于比较新的前沿性议题。

^① 从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来看,本文统计的463个样本可以大致划分为30余个研究议题。除了以下展示的11个主要议题外,还包括理论综合问题、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国际政治心理学、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地区与区域理论、关系与网络问题、地缘政治理论、均势与制衡问题、大国责任问题、国际合作理论、身份与认同问题、软实力、分裂主义问题、崛起与权力转移理论、干涉与调停问题、公共外交、国家形象问题、国际政治中的情感、军控与核问题等20余个议题。这些议题类型的划分,是依照各自的发文数量权衡设定的,而并未严格遵循各类型的学科等级。例如,从学科地位上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与国际安全研究相并列的国际关系学的分支学科,但由于过去四年中国学界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少,因此笔者不再把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论文作更细的划分。此外,如果某篇论文涉及了不同的议题,则分别予以统计。

^② 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及成果梳理,见李巍《IPE在中国的发展与现状评估》,《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1期,第138-175页。

表 2 2008—2011 年中国理论研究的主要议题

单位: 篇

	《世界经济与政治》	《美国研究》	《欧洲研究》	《国际政治研究》	《现代国际关系》	《国际观察》
古代中国思想	7	0	0	1	1	3
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	8	0	2	2	0	10
古代东亚历史经验	2	0	0	6	0	3
国际政治经济学	6	1	1	2	1	1
国际规范	4	0	0	1	0	1
中国学派	5	0	0	4	1	2
同盟理论	3	0	0	0	0	0
规范性理论	4	0	0	1	0	4
国内政治与国家行为(新古典现实主义)	5	0	0	0	0	0
战争相关问题	4	0	0	0	0	0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和语言	6	0	0	3	0	0

	《当代亚太》	《外交评论》	《国际问题研究》	《国际论坛》	《国际政治科学》	小计
古代中国思想	3	1	1	1	17	35
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	1	1	0	2	0	26
古代东亚历史经验	1	2	0	0	8	22
国际政治经济学	1	4	0	0	2	19
国际规范	3	3	0	1	2	15
中国学派	0	2	0	1	0	15
同盟理论	1	2	0	4	4	14
规范性理论	0	2	0	3	0	14
国内政治与国家行为(新古典现实主义)	0	4	0	1	2	12
战争相关问题	0	4	0	1	2	11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和语言	0	1	0	0	0	10

前者与建构主义兴起之后的语言学转向密切相关,强调语言本身对国家身份和国家行为的塑造作用。^① 后者则与国际学术界整体研究层次回落的趋势相一致,^② 强调国家内部因素对国家对外行为的重要影响。特别值得指

① 刘永涛 《话语作为(不)安全实践:语言、理论和“邪恶轴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期,第19—25页;孙吉胜 《语言、身份与国际秩序:后建构主义理论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期,第26—36页;孙吉胜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研究:回顾与展望》,《外交评论》2009年第1期,第70—84页。

② 李巍、王勇 《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3期,第112—142页。

出的是，在这一议题中，中国学者已经不只是在强调国内因素的意义，也不仅是梳理了国外学者的相关成果，而且还遵循这一研究路径，自己动手，作出了原创性研究。^①

5个传统议题、3个新议题，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中国学者不断学习和探索的努力。不过，上述这8个议题都还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已有的议题，无论是研究议程的设置还是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的安排，中国的学者都处于从属和追随的地位。这种状态显然不能令中国学者满意，因而有关中国学派的讨论，近年来依然是中国学者讨论的热点。

相比较于最初只是提出“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口号，近年来中国学界对中国学派的讨论日趋深入和细化，但学者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并不一致。在中国学派的创建路径问题上，张志洲主张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能够形成自身的特色，正在于它是从解答其自身所遇到的具有特殊性的问题开始的。^②但鲁鹏对这种强调中国自身特殊性的倾向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之所以必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不完全吻合。为了证明和保持建立中国特色理论的必要性，中国学者必须更多地立足于中国特殊的经验。但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其研究成果只能被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内的学者所理解和接受。西方学者因为不熟悉中国经验，因此会反过来质疑中国学者据此作出的理论成果的可靠性，这非但不能使得中国学派为国际学术共同体所接受，反而会导致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进一步分裂。^③

在中国学派的思想来源方面，许多学者都赞同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

① 参见钟龙彪《双层认知与外交调整——以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调整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3期，第26—35页；马荣久《国内政治与外交决策——以领土争端中的印度对华决策为例（1959—1962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2期，第33—39页；左希迎《新精英集团、制度能力与国家的军事效仿行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9期，第88—108页。

② 张志洲《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进路——兼论国际问题研究的政策性与学术性》，《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77页。

③ 鲁鹏《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共识及其问题》，第113—117页。

想的发掘。吴征宇指出,由于当代许多重大问题同样是经典思想家们关注的主题,因此考察他们的思想将为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和价值基础。^①任晓更为直接地表示,“建设中国理论和创建中国学派不能没有中国思想、哲学、文化以为奥援,不可不从中汲取营养,它甚至应是一座可能的宏伟大厦的基础”。^②朱锋同样认为,中国的文化和传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宝贵财富”。^③但另一些学者对此则持保留态度。张建新认为,从中国传统知识中汲取智慧的做法具有局限性,因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经常与伦理思想混为一体,缺乏对具体公共问题的论述,同时中国古代思想在形式上重省悟而不重论证,轻视事实和逻辑,缺乏对事件本身的观察与分析。^④谭再文也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不是严格的、规范的和实证的,因此在借鉴时需要获得西方逻辑和实证的支撑。^⑤王帆也指出,借鉴中国古典学说需要解决共时性问题。^⑥

在中国学派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高尚涛认为,中国学派应该坚持关系本位,将本体性关系视为宇宙的本源。在认识论方面,中国学派具有经验主义倾向、整体主义倾向和规范主义倾向三个特点。^⑦而方雷和金鹏则认为,“‘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应该是升华后的复合一元本体论”,即无政府状态首先是一种物质性力量,它规定着国际关系各行为体和要素的行为和状态,但这些行为体和要素在一定条件下又会对无政府性施加反作用。此

① 吴征宇 《马丁·怀特与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思想传统——兼论对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5期,第16页。

② 任晓 《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26页。

③ 朱锋 《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创新研究——新议程、新框架、新挑战》,《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12页。

④ 张建新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终结与“中国学派”成长的困惑》,《国际观察》2009年第5期,第13页。

⑤ 谭再文 《三大国际关系范式的理论构成及其与中国传统理论模式之比较》,《国际观察》2009年第4期,第78页。

⑥ 王帆 《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几点思考》,《国际论坛》2008年第3期,第51页。

⑦ 高尚涛 《关系主义与中国学派》,《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8期,第123—132页。

外,他们认为,中国学派的认识论应强调知行合一,认识依赖于实践活动,并认为认识的来源是本心。^①当然,讨论中国学派的学者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是存在共识的。比如,他们都认为建立中国学派至少是必要的和可能的。此外,他们大都倡导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注重人文方法。^②而这一点与他们对中国学派本身的倡导是一致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赞同“中国学派”或者“中国特色”的提法。阎学通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是没有国籍的。“国际关系理论中‘英国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佛罗里达学派’一样,是指那些系统性还不太完善的理论思想,并不意味着这些理论思想具有国家或民族性。”此外,一国内很可能出现多个相互竞争和对立的理论,这使得我们难以确定以何种理论来作为一个国家的理论代表。^③李巍也认为,因为理论源自对普遍性规律的探索,因此它应当是客观的,是没有“特色”可言的。即使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也不应以“中国特色”为旗帜。“与其说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紧要任务是强行寻找共同点,单独成派,倒不如说是百花齐放更好。”^④

不过,尽管“中国学派”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人们的构想之中,但近年来学术界却出现了“清华学派”的提法,有人将其称为“Tsinghua Approach”。^⑤所谓的“清华学派”的学者并不局限于清华大学

① 方雷、金鹏 《“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认知》,《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3期,第57—58页。

② 王俊生 《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与国别性:一个知识性的梳理》,《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111页;吴征宇 《马丁·怀特与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思想传统》,第16页;任晓 《走自主发展之路——争治中的“中国学派”》,第25页。

③ Yan Xuotong, “Why Is There No Chinese School of IR Theories,” 载阎学通、徐进等 《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阎学通 《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第1页。

④ 李巍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进步”与“问题缺失”》,第29—30页。

⑤ 张志洲 《2011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平常而多元的主题变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第251期, <http://www.csstoday.net/Item/9397.aspx> (访问时间:2012年1月20日)。Feng Zhang, “The Tsinghua Approach and the Inception of Chines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vance Access published, December 15, 2011, doi: 10.1093/cjip/por015.

的教师,他们都坚持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提倡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以倡导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为基本特征”,^①以关注大国崛起战略、东亚秩序转型和东亚历史经验为主要特色。^②最近四五年来,这批学者从事了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发掘和阐释工作。^③“古代中国思想与

① 张志洲 《2011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 平常而多元的主题变奏》。

② 近年来这些方面的相关成果,按发表时间顺序,参见陈寒溪、孙学峰 《东亚安全合作的现实与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3 期,第 49—57 页;周方银 《共同体与东亚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1 期,第 56—62 页;杨原、孙学峰 《崛起国合法化策略与制衡规避》,《国际政治科学》2010 年第 3 期,第 1—31 页;孙学峰 《崛起困境与冷战后中国的东亚政策》,《外交评论》2010 年第 4 期,第 142—156 页;周方银 《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1 年第 1 期,第 29—58 页;孙学峰、黄宇兴 《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当代亚太》2011 年第 1 期,第 6—34 页;徐进 《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问题与构想》,《当代亚太》2011 年第 4 期,第 92—106 页;周方银 《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当代亚太》2011 年第 5 期,第 6—26 页;孙学峰 《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外交评论》2011 年第 6 期,第 33—49 页;杨原 《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当代亚太》2011 年第 6 期,第 6—32 页。

③ 阎学通等编著的两本中文著作《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及英文著作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出版后,海内外诸多学者纷纷撰文予以评论,参见陈玉聘 《国际关系学中的经典与阐释——评〈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国际政治科学》2008 年第 3 期,第 102—114 页;吴征宇 《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评析》,《当代亚太》2008 年第 6 期,第 134—143 页;朱中博:《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资源——评〈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国际观察》2009 年第 3 期,第 30—36 页;王日华 《古代中国的政治霸权论——兼评〈战国策的霸权思想及启示〉》,《国际政治科学》2009 年第 3 期,第 112—124 页;杨倩如 《对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思考——兼评〈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国际政治科学》2009 年第 3 期,第 140—149 页;王日华 《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研究纲领与理论建构——兼评阎学通等著〈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当代亚太》2010 年第 2 期,第 148—160 页;余丽 《借鉴古代思想,研究崛起战略——读〈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实力〉之感》,《当代亚太》2011 年第 5 期,第 144—160 页;邹磊:《中国崛起语境下的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评阎学通〈中国的古代思想与现代权力〉》,《国际政治科学》2011 年第 4 期,即将出版; Linsay Cunningham-Cross and William A. Callahan, “Ancient Chinese Power, Modern Chinese Thought,”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 No. 4, 2011, pp. 349 - 374; Jeremy T. Paltiel, “Constructing Global Ord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an Xuetong and the Pre-Qin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Anarchy,”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 No. 4, 2011, pp. 375 - 403; Feng Zhang, “The Tsinghua Approach and the Inception of Chines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ai He, “A Realist’s Ideal Pursuit,”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vance Access published, December 15, 2011, doi: 10.1093/cjip/por016. 一项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引起海内外学界如此广泛而认真的关注,这对于近年来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而言无疑是罕见的。

东亚历史经验”之所以成为过去四年最受中国学者关注的理论议题，与此有关。“清华学派”的研究能否得到学界最终的认同尚不得而知，但至少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2012年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就《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权力》一书专门设立了一组讨论。^①

笔者的统计显示，“古代中国思想”这一议题在过去四年的发文量达35篇，是过去四年最受中国学者关注的议题。而另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议题“古代东亚历史经验”在过去四年的发文量也很多，达22篇，排在第三位。中国学者对这个议题的关注度如此之高，不仅体现了中国学者对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突破的强烈渴望，更反映出一部分中国学者已经开始从单纯的“喊口号”进步到着手实际的文献发掘和阐释工作。这种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和不畏风险的探索精神，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古代中国思想”和“古代东亚历史经验”两个分议题，前者旨在探索有助于理论创造的思想源泉，后者旨在寻找古代东亚历史中那些尚未被以近代欧洲经验为基础的现有理论所回答的问题和困惑。两者最终的目的都是要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寻找到一条属于中国学者自己的道路。

然而，要诉诸中国古代的思想和历史，首先需要解决中国古代思想和历史的适用性问题，即古代中国及东亚地区是否能够被看做一个类似于近现代国际体系的世界。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和历史能否被用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前提。从笔者回顾的文献看，对于这个问题，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持肯定观点：^②即使古代中国及东亚地区不能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体系，但也与近现代主权国家体系有着足够的可类比性。陈玉聃认为，春秋时期随着周王朝中央权力的逐渐衰弱，诸侯国之上缺少最高权威的制约，同时诸侯国又都以其内部认同和武装力量为重要特征，因此在内外两个方面，古今的“国家”都具有相同之处。^③杨倩如和吴征宇更直接

① 参见2012年达沃斯会议日程手册：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② 尽管也有个别学者持否定的观点，参见辛万翔、曾向红《春秋战国时期存在“国际法”吗》，《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第154—156页。

③ 陈玉聃《国际关系学中的经典与阐释》，第107页。

地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已经具备了现代国家的领土和主权特征,相互间不但存在着密切而复杂的互动,而且在国家间关系和国内政府和社会关系上也都与近代以来欧洲的情形十分类似。^①胡波也指出,秦汉时期东亚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强大的国家,并且彼此间出现了规模庞大、模式复杂的互动,自那时起,东亚地区就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国际体系。^②

正是在这个前提性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众多的学者才对上述这两个议题表现出了如此高的热情。在古代中国思想方面,从2005年起,阎学通所带领的清华学术团队比较早地开展了先秦政治思想的挖掘工作。^③在此基础上,阎学通对先秦7位主要思想家的国际政治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和总结。^④除了清华团队对春秋战国时期典籍所作的梳理和评介之外,其他一些学者将视角扩展到了更为广泛、更为细致的方面。例如,朱中博、肖晞、王鹏等对老子、墨子和纵横家战略思想的研究,王日华对中国传统国家间信任思想以及孔子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余丽等对中国传统国家间道义思想的比较研究,叶自成对贾谊民众主义

① 杨倩如 《对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思考》,第141页;杨倩如 《先秦国际体系的类型与演变》,《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1期,第97页;吴征宇 《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第137页。

② 胡波 《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肇始》,《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59页。

③ 2008年以来清华团队发表的有关古代思想的文章,按发表时间顺序,参见孙学峰、杨子潇 《韩非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2期,第81—97页;刘江永 《〈管子〉国家间政治思想初探》,《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3期,第36—56页;朴柄久 《〈礼记〉的和谐世界思想》,《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3期,第57—70页;阎学通、黄宇兴 《〈战国策〉的霸权思想及启示》,《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4期,第79—102页;徐进 《孟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及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第6—16页;王海滨 《〈吕氏春秋〉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1期,第59—78页;李彬 《墨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2期,第61—87页;徐进 《在儒家的两端:兼评〈荀子的国际政治思想及启示〉》,《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3期,第125—139页;阎学通 《借鉴先秦思想创新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3期,第150—165页。其中许多文章以及此前发表的文章,收入《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和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两本书中。

④ 阎学通 《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87—108页。

思想的研究,等等。^①可以说,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中国学界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已粗具规模,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所独有的课题。

除此之外,自赵汀阳2005年用“天下”这一中国传统概念重构了关于世界秩序的认识系统之后,近年来关于“天下体系”思想的研究和探讨也日益增多。周方银对赵汀阳评价世界制度优劣的标准进行了逻辑上的批判;^②李明明区分了“天下思想”中的政道和治道两种概念,并认为后者而非前者符合当今全球治理发展的需要;^③冯维江、刘涵等学者则由“天下体系”切入,将中国传统制度的理论范型与西方制度实践以及有关国际秩序的理论进行比较;^④所有这些工作都在将我们对中国传统国际政治思想的认识引向深入。

与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相对应的,是对古代中国及东亚地区历史经验的发掘。不少学者都将目光投向了先秦时期的国家间体系。杨倩如将先秦国际体系划分为权力平等型(尧、舜、禹时期)、王权等级型(夏、商、西周时期)和霸主结盟型(春秋战国时期)三种类型,并指出观念的建构在国际体系的演变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⑤王日华考察中国从西周时期以周王权为核心的单极霸权体系直到战国时期的多极体系的

① 朱中博、周云亨《老子的大战略思想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2期,第156—167页;肖晞、刘笑阳《墨家思想对中国国际战略定位的启示》,《国际观察》2011年第2期,第45—51页;王日华《中国传统的国家间信任思想及其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3期,第100—121页;王日华《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5期,第47—54页;余丽、李涛《中国国家间道义思想探本溯源:基于先秦诸子国家间道义思想的对比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3期,第66—99页;叶自成《从贾谊的民众主义看国际关系主体的重新定位》,《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40—49页。

② 周方银《天下体系是最好的世界制度吗?再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2期,第98—104页。

③ 李明明《论天下思想中的政道与治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2期,第109—125页。

④ 冯维江《试论“天下体系”的秩序特征、存亡原理及制度遗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第4—29页;刘涵、王存刚《论英国学派的国际秩序观:兼与天下体系理论的秩序观比较》,《国际论坛》2011年第6期,第41—46页。

⑤ 杨倩如《先秦国际体系的类型与演变》,第96—111页。

转变,也认为道义观念在体系转变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①胡波和姜维清对战国时期东方六国未能有效制衡秦国扩张这一经典问题进行了富有创新性的研究,他们认为,六国预期的核心收益类型的趋同加剧了集体行动困境、信任沟通问题和相对收益问题,因此导致了合作的失败。^②此外,学者们还尝试将先秦国际体系与当代国际体系以及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某些方面进行对比,以寻找富有启发性的异同之处。例如,王庆新考察春秋时期的华夏秩序后指出,国际秩序的稳定并不只受大国实力消长的影响,还与文明的竞争和融合密切相关。^③陈琪和黄宇兴通过考察《左传》的记载,指出春秋时期的干涉行为更多的是出于维护现状而非扩张获利的目的,并且干涉国自身实力的增长本身就会对其干涉行为提供合法性。^④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开始研究自秦汉以来大一统时期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中最核心的是对朝贡体系的研究。张锋对以费正清学说为代表的主流朝贡体系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主张超越朝贡体系概念的束缚,而对古代东亚国际政治提出更加完善的理论框架。^⑤其他一些学者则从不同角度对朝贡体系本身进行了探讨。尚会鹏认为,朝贡体系存在着“亲人”、“熟人”和“生人”三种文化,正是这三种文化以及其造就的“名分”维持着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天下秩序。^⑥简军波则指出,朝贡体系的观念结构由儒家思想、天下观和华夷秩序三个层面构成,这种观念结构发挥着提供政治合法性、保持体系内经济繁荣以及维护地区稳定的功能。^⑦李

① 王日华 《道义观念与国际体系的变迁: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例》,《国际观察》2009年第1期,第54—60页。

② 胡波、姜维清 《预期收益类型的趋同与六国“合纵”的失败》,《国际观察》2010年第3期,第53—62页。

③ 王庆新 《春秋华夏天下秩序的启示》,《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第59—85页。

④ 陈琪、黄宇兴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基于〈左传〉的研究》,《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1期,第33—73页。

⑤ 张锋 《解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第33—62页。

⑥ 尚会鹏 《“伦人”与“天下”:解读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29—43页。

⑦ 简军波 《中华朝贡体系:观念结构与功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第132—143页。

扬帆研究了朝贡体系的瓦解问题,指出明清易代使得东亚行为体对彼此身份的认知产生了动荡和重塑,这是朝贡体系瓦解的真正开端,而与西方后来的冲击无关。^①此外,周方银从策略互动的角度对朝贡体系的稳定性进行了全新的解释。^②

“古代中国思想”和“古代东亚历史经验”在过去四年中受到中国学者高度的关注,并且已经涌现出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成果,这或许意味着,中国学者正在超越“中国学派”的空想和“空喊”阶段,而进入对本国思想和实践经验的真刀实剑的探索钻研中。同时,这个议题也是中国学者开始摆脱西方研究议程的束缚而独立开辟的研究领域。这对于一心要为国际关系理论作出独有贡献的中国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可喜的局面。

不过,学者们在潜心考证历史、埋头研读古籍的同时,不应偏离国际关系学者从事这个议题研究的最终目标:借鉴中国传统智慧和经验而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创新。^③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核心的目的,在于探寻具有一般性的国际关系规律以帮助人类更好地理解当下的国际关系现象,并对当下的国家政策的制定以及未来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的预测提供智力支持。这是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学的根本区别之一。也就是说,(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应该至少能够解释当下的国际关系。这就要求那些投身“古代中国思想”和“古代东亚历史经验”这两个议题的学者,不仅要能非常专业地“潜身”历史,而且还要自觉地“观照”当下,将中国历史与当今的世界现实联系起来。

这就好比中国的医学家要想在医学理论上取得令国际同行尊重的贡献,当然可以诉诸祖国传统医学的思想和经验。但中国医学理论研究和国外医学理论研究的比拼,最终当然是要看谁创造出的医学理论能够更好地

① 李扬帆 《涌动的东亚:明清易代时期东亚政治行为体的身份认同》,《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3期,第126—150页。

② 周方银 《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第29—58页。

③ 阎学通 《借鉴先秦思想创新国际关系理论》,第150、165页。

把疾病治好，而绝不会是比谁的文言文好，谁对中国文言文医学典籍原著的梳理和考证更准确；更为重要的是，比拼的关键是谁的医学理论能把当代的疑难病症甚至不治之症（比如艾滋病）治好，而不是比谁的理论能够更好地医治古代曾经的不治之症（比如天花）。即使通过挖掘中医典籍创造出一种理论，而且根据这种理论治疗某种曾经的不治之症的效果比当代其他任何医学理论都要好，但假如这种病症本身在当今时代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已经不构成医学上的难题，那么这种医学理论的意义也同样非常有限。

相类似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古代中国思想”和“古代东亚历史经验”两个议题的研究，不能只满足于对古代思想和古代历史的解读，而要更进一步，努力创造出具有系统性和解释力的理论假说，并且这种理论假说，不仅要能很好地解释古代中国的历史（这当然是必需的），还要能对西方学者所熟悉的近现代国际关系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解释。这就意味着，中国学者在研究古代思想和历史的过程中，非不应回避，反而应该迎难而上地面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诸多经典问题（比如战争的原因、合作的原因、体系稳定的原因、权力竞争和转移的机制，等等）。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为当代国际关系学贡献理论知识，也才能够真正赢得西方同行的尊重。

（二）创新成果及创新经验

如上所述，理论研究的终极目的是创造新理论。理论创新型研究占全部理论研究成果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学科某阶段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然而遗憾的是，学术创新正是中国国际关系学长期以来的软肋。秦亚青 2008 年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行一次全面的回顾，并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包括前理论阶段、理论学习阶段和理论创新阶段。其中，理论创新阶段的特征是提出具有明确核心假定的原创型理论，并成为解释和理解现实的有力工具。基于这一标准，秦亚青认为，到 2007 年为止，中国仍处于理论学习阶段的深化期，尚未进入理论创新

阶段;^① 中国不但没有出现宏观层次理论, 而且中层理论的创新同样凤毛麟角。^② 李巍在 2007 年的一篇回顾性文章中也认为, 此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进步”, 都只是“理论引进的进步”, 缺乏自己独立的理论创造。^③ 这两位学者对于 2008 年以前中国理论创新状况的判断可能略显谨慎, 但如果根据字面意思加以比照, 我们将会发现, 2008 年以后中国的理论研究创新乏力的局面正在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判断一项理论研究是否取得创新是困难的。为了统一标准且便于操作起见, 笔者借鉴此前学者的做法, 将论文是否提出了新的理论假说, 作为判断该论文是否有理论创新的操作化标准。^④ 根据这一标准, 在笔者所统计的 463 篇样本中, 共有 65 篇创新性论文, 占样本总数的 14.0% (它们在各期刊的分布见表 3)。也就是说, 目前, 中国学者平均每写 10 篇理论

表 3 2008—2011 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样本中创新成果分布

单位: 篇, %

	创新性论文篇数	占本期刊理论文章的比例	占创新总数的比例
《世界经济与政治》	17	12.9	26.2
《美国研究》	0	0	0
《欧洲研究》	4	22.2	6.2
《国际政治研究》	2	4.3	3.1
《现代国际关系》	2	2	3.1
《国际观察》	9	17.0	13.8
《当代亚太》	7	33.3	10.8
《外交评论》	9	13.6	13.8
《国际问题研究》	0	0	0
《国际论坛》	1	2.1	1.5
《国际政治科学》	14	22.6	21.5
总计	65	—	100

① 秦亚青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 第 15—18 页。

② 同上, 第 21 页。

③ 李巍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进步”与“问题缺失”》, 第 25 页。

④ 秦亚青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 第 20 页; 杨原 《中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现状分析 (2001—2007)》, 第 60 页。

研究性的论文,就会出现大约 1.4 篇创新性的论文。考虑到统计的全部样本中包括了书评等原本不以创新为目的的论文类型,再加上一些没有明确提出理论假说的论文中也可能包括有创新的成分,因此实际的创新比例应该还高于这个数字。这个比例与西方同行相比当然还很低,但是从纵向上看,自己和自己比,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中国学者过去四年在理论创新的道路上所作出的努力。

过去四年中国理论研究的一个亮点,是出现了宏观层次的理论创新。这是中国学者努力超越已有理论范式而寻求对国际关系整体作出全新解读的重要标志。2009 年秦亚青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这一理论概念。^①他引入“关系”这一中国文化的重要理念,将其作为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硬核,将“关系本位”作为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假定,并认为关系网络确定身份,孕化权力。这种以关系为本体的理论思路被随后的其他学者沿袭和深化。^②2010 年唐世平提出了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理论。^③他将进化范式引入国际关系领域,揭示了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进化机制。^④此外,杨原从批判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功能的假定入手,借鉴社会学的功能主义思想,提出了体系层次的国家功能理论。^⑤

中观和微观层次方面,创新成果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相对而言,传统安全问题研究、国际规范的传播和演化以及国际制度与国家的相互作用

① 秦亚青 《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 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3 期,第 69—86 页。

② 高尚涛提出了“关系主义”的分析框架,详细阐释了关系主义在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方式上的特性。高尚涛 《关系主义与中国学派》,第 116—138 页。曹德军和陈金丽将关系本位思想和网络分析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关系网络理论的分析框架。曹德军、陈金丽 《国际政治的关系网络理论: 一项新的分析框架》,《欧洲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69—82 页。

③ 唐世平 《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 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第 5—31 页。他关于这一主题的英文专著见 Shiping Ta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④ 李江春遵循这种社会进化的思路,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念及战略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命运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见李江春 《防御性现实主义: 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悲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11 期,第 99—123 页。

⑤ 杨原 《体系层次的国家功能理论——基于对结构现实主义国家功能假定的批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11 期,第 129—153 页。

用是涌现创新成果较为集中的议题。

有关传统安全问题的创新成果涉及了权力转移、联盟、制衡、崛起战略、冲突调停等各种经典安全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工作包括：尹继武借鉴社会心理学理论，提出了弱勢理性主义模式和社会认知模式两种解释联盟信任生成的理论。^① 刘丰综合国际结构和霸权正当性两个概念，重新解释了近代以来的大国制衡行为。^② 高程从经济动因的视角重新解释了崛起国的行为选择，指出经济崛起路径的畅通与否决定了最终的崛起战略。^③ 左希迎遵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路径，从国家内部因素入手解释了国家的军事效仿行为。^④ 柳思思通过综合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关于身份认知的认识，提出了身份认知决定不对称冲突的假说。^⑤ 邝艳湘通过博弈模型和案例研究，指出经济相互依赖虽然无助于降低低级别冲突的概率，但能有效抑制冲突的升级。^⑥ 漆海霞、陈冲等学者分别通过统计方法对国际调停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找到了影响调停结果以及调停供需双方意愿的相关因素。^⑦ 同样基于大样本统计，杨少华对不对称冲突中弱国战胜强国的原因作出了解释。^⑧ 等等。

有关国际规范问题的创新成果集中于规范的传播和演化两个议题。黄超结合冷战后国际规范传播的实践，指出人道主义化框定、支持性规范联系和情感化宣传是三种推进国际规范传播的有效战略。^⑨ 柳思思则将实践

① 尹继武 《联盟信任的生成机制》，《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4期，第35—78页。

② 刘丰 《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制衡行为》，《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3期，第1—35页。

③ 高程 《市场扩展与崛起国对外战略》，《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3期，第1—43页。

④ 左希迎 《新精英集团、制度能力与国家的军事效仿行为》。

⑤ 柳思思 《身份认知与不对称冲突》，《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2期，第114—127页。

⑥ 邝艳湘 《经济相互依赖、退出成本与国家间冲突升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第123—138页。

⑦ 漆海霞 《国际调停历史与策略的量化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6期，第98—117页；陈冲、卢璟 《国际危机调停的供需因素（1918—2001）》，《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2期，第1—39页。

⑧ 杨少华 《弱者何以能胜》，《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3期，第1—35页。

⑨ 黄超 《说服战略与国际规范传播》，《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9期，第72—87页。

引入进规范传播的议程,认为实践过程重构了语言的意义,变化了的语言意义又导致了规范的传播。^① 林民旺和朱立群研究了规范的国内化问题,他们的研究显示,国内制度、国内利益和规范匹配程度等国内结构是影响规范传播的最重要因素。^② 谢婷婷则从相反的角度,从行为体策略的角度探究了规范传播失败的原因。^③ 在规范的演化方面,阎学通借鉴先秦思想中“王、霸、强”的概念,揭示了主导国性质与国际规范演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尤其他提出主导国可以通过“自身示范—他国效仿”这一路径影响国际规范,是此前有关规范演化的研究所没有注意到的。^④ 徐进对战争法规范的演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指出战争法规范的变迁是人类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⑤

在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的理论创新方面,刘宏松集中研究了非正式国际机制问题。他对正式和非正式国际机制的概念进行了区分;并从国内偏好、承诺可信性需求和国家间相互依赖的结构性特征等方面探讨了国家选择非正式国际机制的动因问题,认为国家选择非正式国际机制是国内层次和国际层次的激励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还从全球福利的角度研究了非正式国际机制的有效性,指出如果大国在其他方面的利益需求大于其在有效解决全球公共问题方面的需求,那么对非正式国际机制的修改就会损害全球福利。^⑥ 田野研究了国际制度与国家自主性的关系,指出当国际制度所发挥的功能与国家的目标基本一致时,国家会利用国际制度来增强其自主性。^⑦ 王

① 柳思思 《规范传播视角下的“吉哈德主义”》,《外交评论》2011年第2期,第73—83页。

② 林民旺、朱立群 《国际规范的国内化:国内结构的影响及传播机制》,《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第136—160页。

③ 谢婷婷 《行为体策略与规范传播:以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为例》,《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99—117页。

④ 阎学通 《国际领导与国际规范的演化》,《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第1—28页。

⑤ 徐进 《战争法规范演变的动力》,《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1期,第1—32页。

⑥ 刘宏松 《正式与非正式国际机制的概念辨析》,《欧洲研究》2009年第3期,第91—106页;刘宏松 《非正式国际机制的形式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0期,第73—96页;刘宏松 《非正式国际机制与全球福利》,《国际观察》2010年第4期,第11—19页。

⑦ 田野 《国际制度与国家自主性:一项研究框架》,《国际观察》2008年第2期,第26—32页。

玮研究了国际制度对非成员国的作用，探究了国际制度对非成员国行为产生影响的具体条件。^① 史明涛区分了正向和反向两种参与国际制度的形式，并指出具体参与形式的选择受国际制度的国内分配效应以及国内行为体偏好差异的影响。^②

过去四年中国学界固然涌现出上述许多理论创新的成果，但从比例来说毕竟仍只占全部研究成果的很小的一部分。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创新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大家更迫切想知道的是，究竟怎样才能实现创新。秦亚青曾撰文对学术创新的路径作过详细的剖析，^③ 但他所举的例子都是国际知名学者所作的优秀研究，这当然有“法乎其上，得乎其中”的意义，但毕竟距离中国学者的研究实际比较远，不易形成直接的比照。而近四年来中国学者也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创新性研究。我们不妨从这些成果入手，总结属于中国学者自己的理论创新经验。纵观过去四年的创新成果及其作者，大体上具备以下三个特点。

(1) 敏锐的问题意识

科学的核心任务是扩展人类的知识范围。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首先知道已知和未知的边界。这个边界，就是我们常说的研究问题 (research question)，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就是我们面对未知所产生的困惑 (puzzle)。正因如此，我们才会说“找到一个问题有时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只有找到困惑，我们才能明确已有知识的范围，才能在这个困惑的困扰和启发下，找到知识扩展的努力方向。由此可见，寻找到一个有冲击力的问题，是实现理论创新的先决条件。

在科学理论研究中，最有冲击力的研究问题是经验困惑，即那些难以被常识或者现有理论所解释的现象。我们所统计的 65 篇理论创新性论文，几乎每一篇都提出了非常明确的研究问题，其中一些更是在看似平常无奇

① 王玮 《国际制度对非成员国的作用》，《国际观察》2009 年第 2 期，第 65—72 页。

② 史明涛 《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一个国际—国内制度互动的解释》，《国际观察》2009 年第 2 期，第 57—64 页。

③ 秦亚青 《研究设计与学术创新》。

的现象中敏锐地捕捉到了有趣而又引人深思的经验困惑。例如,大国崛起过程中的战略选择是权力转移理论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外学者对此已经作出了非常丰富而又经典的研究。但高程在大家熟悉的历史中“奇怪”地发现,威廉二世时的德国实力积累还颇为不足,就急于对现有秩序发起激烈的挑战,而二战前的美国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实力优势,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意争夺体系霸权,这是为什么?在实力不足时就挑战现有霸权,成功的可能性显然不高,可为什么像威廉二世时的德国这样的国家就不愿意等待更为有利的时机呢?高程受这个困惑的驱动,展开研究,最终将经济利益诉求作为解释崛起国行为选择的核心变量,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安全或政治权力解释的新逻辑。^①

又如,有关冷战后对美国制衡的缺失以及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一直是学界讨论的两个热点问题,相关成果也早已汗牛充栋。但杨原将这两个原本分开讨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重新去审视。他将冷战后中美两国的互动与此前历史上霸权国和崛起国的互动进行对比后发现,以前军事同盟总是成对地出现,冷战后却长期只有一个同盟体系;以前总是崛起国先挑衅,而冷战后却偏偏是已经成为单极霸权国的美国抢先改变现状,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霸权国和崛起国的互动模式会在冷战后出现这种变化?他进而从理论一致性的角度指出,现有的那些看似言之成理的解释(相对实力、安全威胁、损失厌恶),充其量只能解释中美两国中一方的行为,而对另一方的行为则无力解释(甚至会与对前一方的解释相抵牾)。他正是沿着这种经验和理论上的双重困惑,最终提出了一个能够自恰地解释当代霸权国和崛起国互动的动态理论框架。^②

(2) 广博的知识视野

国际关系学是政治学的二级学科,处于知识生产的下游,它的学科地位决定了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汲取和运用上游学科已有的知识成果。从国

^① 高程 《市场扩展与崛起国对外战略》。

^② 杨原 《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

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都与其作者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引进和借鉴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这么说，假如华尔兹、基欧汉、杰维斯、温特等学者没有学习过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系统科学的知识，那么他们也就没有可能创造出如今早已成为本学科经典的那些重要理论。换句话说，要想在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领域有所建树，只学习国际关系学本身的知识是不够的，还要广泛涉猎其他学科的知识，并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本学科的理论研究实战。

过去四年中国理论研究的一些重要的创新成果，印证了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上述规律。例如，唐世平的“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研究，就充分借鉴了生物和社会进化论的思想。他在文章中专门用一节的篇幅来介绍进化论方法。他指出，进化论方法的核心机制是变异—选择—遗传。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只有物质力量发挥作用，而后者则是物质和精神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对社会进化的解释中必须包含精神力量的作用。此外，社会进化范式从微观层面的内生性力量来解释系统的变革，这种变革源于系统内部行为体相互作用的不断累积。所有这些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对他随后的理论创造提供了最基本的思考路径。他随后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行为体的互动特征入手，给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逐渐自我演化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内生性机制。同时他在另外三个辅助性机制中，强调了观念对于系统进化的重要作用。^①

再如，尹继武关于联盟信任生成时点及方式的研究，大量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成果。他首先区分了工具性信任和情绪性信任两种信任类型。对于情绪性信任而言，现有的理性选择理论只能揭示哪些理性变量有助于情绪性信任的产生，而并没有继续探究为什么、如何以及何时产生的问题。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引入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论。情绪性信任的建立有赖于盟友间积极情绪的产生与维系。而只有将某一行为及其结果归因为对方的属性因素，才会产生人际情绪（积极/消极情绪），如果

^① 唐世平 《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

归因为情境因素,则很难产生积极情绪。因此,只有将盟友的行为归因为内在属性,才有可能产生情绪性信任;而如果将其归因为外部情境,则只可能产生工具性信任。尹继武进而利用现有的社会心理学成果,分析了决定归因方式的因素,以及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人员在归因倾向上的偏差,最终提出了一套逻辑完整且自恰的联盟信任生成的社会认知理论。^①

(3) 扎实的逻辑和实证能力

当我们找到了好的研究问题后,同时也已经借鉴已有的知识和理论初步形成了对问题答案的猜想,接下来面临的任务是如何严谨地阐释和证明这种猜想。理论研究尤其强调思维的严密性、系统性以及解释的有效性,这就对研究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实证分析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研究者要具备强大的抽象思维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清晰、严密地构造并展示出自己的理论假说;另一方面,研究者要尽可能多地掌握各种研究方法,以胜任不同问题对实证检验的需要。在过去四年中国理论研究的创新性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显示了其作者良好的逻辑素养和实证功底。我们不妨以两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为例,以供后来的学者学习和借鉴。

周方银的论文研究的是朝贡体系稳定的原因。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既要实现对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已有解释的超越,更要对跨越千年之久的朝贡历史予以宏观的把握,最终还要抽象出一个一般性的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假说。这些对于任何想要研究这个问题的研究者而言都是不小的挑战。然而,周方银凭借其清晰的逻辑思维和娴熟的博弈分析技术,举重若轻地完成了任务。他首先确定了分析的两个基本假定,进而将朝贡体系下中国和邻国的策略选择分别抽象为两类,建立了初步的策略互动矩阵。然后根据古代东亚历史的基本常识,确定了5对策略组合的效用大小关系。此时,只剩下两对策略组合无法确定其效用的大小关系,即{中国怀柔,周边邻国骚扰}与{中国怀柔,周边邻国臣服}对于周边邻国的效用,

^① 尹继武 《联盟信任的生成机制》。

以及 { 中国怀柔, 周边邻国骚扰 } 与 { 中国征伐, 周边邻国骚扰 } 对于中国的效用, 分别孰大孰小。周方银从这种不确定性入手, 分类讨论, 最终建立了中国与邻国博弈的策略循环模型, 揭示了朝贡体系内部互动的动态过程。^①

在检验理论假设的过程中, 有多种研究方法可供选择, 其中最主要的是统计分析和案例研究。但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如前所述, 统计分析能够可靠地发现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但无法判别这种相关性是否因果关系。案例研究虽然难以保证变量关系的一般性, 但能对变量间的因果机制作出追踪和检验。^② 因此, 最具说服力的实证检验是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 先用统计方法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再用代表性案例检验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杨少华的《弱者何以能胜?》就是这两种实证方法综合运用的精彩实例。他研究的问题是二战以后弱者频频战胜强者的原因。他首先根据文献回顾, 确定了四种可能的解释变量, 然后对 1945—2007 年不对称冲突的样本进行统计,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 弱者是否采用不对称战略与不对称冲突的结果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他进而以伊拉克战争为例, 对不对称战略与冲突结果之间的因果机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③

（三）中国当前理论研究的不足

秦亚青在回顾 2008 年以前的中国理论研究时, 指出了当时中国学界的三大缺失, 分别是突破性理论的缺失、中国范式的缺失以及主体意识的缺失。^④ 根据笔者上述的梳理, 这三方面缺失的情况在最近四年中已经有了改观。例如, 出现了宏观层次的原创性理论; 中观/微观层次的创新性

① 周方银 《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

② 参见漆海霞对这两种方法的比较分析。见漆海霞 《国际关系学科中研究方法的应用分野》, 第 150—154 页。

③ 杨少华 《弱者何以能胜?》。

④ 秦亚青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 第 21—23 页。

工作更是正在从偶然发展为常态,甚至部分创新成果的前沿性、开创性和规范性已经足以与西方同行的成果相比肩;还出现了像“古代中国思想和古代东亚历史经验”这样中国主体意识浓郁的核心议题。但是,这些方面的进步并未改变中国理论研究整体落后的惯有局面。文献梳理和历史描述方法使用率高达 85.1%,非创新成果占样本总数的比例高达 86.0%,中国理论研究的总体水平并未出现质的变化。

李巍曾经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不足作过总结。其一是缺乏研究问题。“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大行其道的仍是描述性思维传统”;“由于不是以具体的问题为研究的导向,从而带来了无论是在理论介绍还是经验陈述方面,低水平重复性建设始终是中国学界一个难以克服的顽疾”;“缺乏问题意识,缺乏因果思维的传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匮乏的根源。”其二是摒弃经验事实。“很多理论性文章完全没有充分的经验事实的支撑”,既不能“对西方理论进行有价值的批判”,又不能“很好地运用西方理论来解释现实”。其三是研究方法的薄弱。其四是理论考据之风兴盛。不少学者“对诠释、考据西方理论乐此不疲,热衷于对西方理论进行细致的考据”,考据的成果“越来越出现重复性建设和琐碎性、细节化两大特点,而忽略了西方理论建构的实质内涵”,并且考据工作“更多是评介而不是批判”。^①

时至今日,上述这四项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中国理论研究的主要特征。李巍的文章对此已经作了深入的分析,这里不再赘述。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理论研究还存在着另外两个问题,有待学者们重视和解决。

一是热衷口号,不尚实干。唐世平曾撰文对中国国际关系学术期刊上充斥的“口号型”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②这种“口号型”文章要么只是对既有理论提出不甚深入的批判,然后提出“新的理论发展方向”,

^① 李巍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进步”与“问题缺失”》,第 25—28 页。

^② 值得指出的是,唐世平(以及笔者)并非完全反对“口号型”文章的存在,例如可以发表在报纸和网络媒体上。只是不宜在严肃的学术期刊上以规范的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这类文章。

要么只是指出某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以及需要吸收哪种理论来进行研究。但是“通篇只见作者呼吁的方向，却不见其在认定的方向上前行半步并展示它的成果”。“这些文章只是号召别人去发展，自己却从不真正发展任何理论”。^① 根据笔者的回顾，这种空喊口号的现象，在过去四年中国理论研究的文章中的确非常普遍。有相当一部分文献梳理型和逻辑思辨型的论文，都属于这一类文章。论文是研究成果的文字展示，研究成果是通过脑力和体力的付出“做”出来的，而不是空想出来的。“口号型”的论文，即使再是鸿篇巨制，也只是一种“口号”，只是在“说”，而没有真正去“做”。提出一种美好的口号和目标是容易的，但埋头默默钻研和创造是艰难的，其过程是寂寞和辛苦的，其结果更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正如唐世平所说“我们都知道引进和超越，但重要的是做给我们看从而告诉我们如何做，而不是给我们训话。”^②

“口号型”文章的大量出现，是这一阶段中国学者创新意识逐渐增强的一种体现。研究者不再满足于仅仅对已有的理论进行单纯的梳理，也不满足于对某个现象作出简单的描述，而还想提出一点属于自己的“想法”。但是，之所以有了创新意识却做不出创新成果，而只能流于“口号”，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研究者创新能力的不足，这就需要加强研究方法和研究技能的培养；但另一方面，其症结恐怕还在于研究者对待研究的态度不够认真，不愿为实施一项研究工作而付出脑力和体力上的努力。其实，“口号型”文章所提出的“口号”中，不乏很好的想法或建议。学者们需要做的，就是着手将这些“口号”变成实际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实干精神正是中国学界目前所缺乏的。

例如，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提出，建立“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应该积极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③ 可直到十年之后，才由别

① 唐世平 《与“口号型”文章决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2月23日，第4版。

② 同上。

③ 梁守德 《论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1994年第1期，第20—21页。该文写成于1993年10月。

的学者开始真正着手做这项工作。^①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包括提出这个建议的学者在内的中国学术共同体, 都未能将这个口号付诸实践。究其原因, 恐怕就在于: 提出一种“研究议程”或者“建议”是轻松的, 而一字一句地研读文言文典籍、理解和阐释古代思想的实际工作却是艰苦的, 是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 而且是有风险的。投入精力研究古代思想固然无法保证一定能够由此作出国际关系理论上的创新, 但如果不做这项工作,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这条路究竟是否行得通。而另一方面, 假如通过发掘古代思想在将来真的实现了理论创新, 那么这就意味着, 国际关系学某个领域的知识进步因中国学者的观望而被推迟了 10 年左右的时间。如果真是那样, 那真会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再如, 周方银和王子昌在《三大主义式论文可以休矣: 论国际关系理论的运用与综合》一文中, 曾以一篇试图解释美国对东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态度变化的文章为反面例子, 展示了规范的研究步骤。由于做任何解释都必须至少用到一个规律,^② 因此如果真要像那篇例文的作者所希望的那样, 综合运用权力、机制和认同三个变量来解释美国在东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问题上态度变化的原因, 就必须首先知道权力、机制和认同与国家对地区安全合作的态度之间是否存在一般性的规律。而要寻找这种规律, 就需要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 或者至少通过多个不同的案例, 来观察当权力、制度和认同这三个自变量分别处于不同的取值水平时, 国家对地区安全合作的态度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即使每个自变量都只包括高/强、低/弱两个取值, 三个自变量各种取值水平的组合也有 8 种之多。研究者必须通过足够多的观察对象, 来考察这 8 种自变量组合分别与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显著的联系。^③ 显然, 研究者如果没有大量智力和体力

① 叶自成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3 年版。

② R. 卡尔纳普 《科学哲学导论》(张华夏、李平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6—9 页。转引自周方银、王子昌 《三大主义式论文可以休矣: 论国际关系理论的运用与综合》, 《国际政治科学》2009 年第 1 期, 第 95 页。

③ 周方银、王子昌 《三大主义式论文可以休矣》, 第 95—97 页。

上的投入,是很难完成这样的研究步骤的。这有赖于研究者认真的态度和实干的精神。

制度塑造文化,这是国际关系学者所熟悉的原理。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中国学者实干精神的培养。如上所述,发扬实干精神真正地去从事科研实践,其过程是艰苦的,其结果是不确定的,是有风险的。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不真正地去“做”研究,只是空喊口号,写出的文章同样能在国内顶级的期刊上发表,那么“写‘口号型’论文”就会成为研究者的“理性”选择。换言之,如果没有外部机制的调节,很难改变当前中国学界“不尚实干”的风气。对于学者来说,最重要的外部调节机制是期刊的导向。2006年薛力和肖欢容在一篇回顾性文章中建议,国内期刊应该增加发文的字数。^①这一建议在几年后被《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几份主要刊物所采纳。^②但篇幅的长短并不能保证文章的质量,更不能防止“口号型”论文的出现。因此笔者建议,国内主要期刊在选稿时可否考虑增加一项指标,即“作者是否在本篇文章中做了他自己所倡导的工作”。

二是各自为战,缺乏争鸣。回顾过去四年中国理论研究的成果,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学者们习惯于各自为战,即使研究领域和议题相同的学者,也大都只关心自己的问题和观点,相互之间很少有直接的对话和争鸣。这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国际学界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理论议题,诸如“均势理论”、“民主和平论”、“本体安全”、“观众成本”等,无不形成了非常庞大的研究体系。这些议题之所以能够不断得以深化和扩展,直接源于从事这些议题研究的学者的相互审视和相互检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西方学者往往围绕具体研究议题组成学术网络和群体,不仅各自产生众多的研究成果,而且研究相同议题的学者之

^① 薛力、肖欢容《中国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成就与不足(1998—2004)》,第48页。

^② 目前《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研究》、《当代亚太》、《外交评论》、《欧洲研究》和《国际政治科学》发文的字数一般都在1.5万字以上。《国际政治科学》上的个别论文甚至达到了3.5万字以上。这当然是中国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的一个重要进步。

间还会形成对话和争鸣。与之相比,中国学者在议题选择上仍然处于“圈地”和“寻找空白”的阶段,形不成讨论、争辩和批评。^①

缺乏学术上的争鸣和批评,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学者自身研究的程度和水平还不够,以至于只能先“圈地”;但另一方面,这可能也是中国学者不关心本国同行工作的结果。在笔者统计的样本中,有很多论文的文献综述部分几乎全部引用国外文献的论文。不关注本国同行的研究,彼此之间当然也就不可能在同一议题下形成交锋和争论了。诚然,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整体水平比西方同行要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一个特定的问题上中国学者都还没有作出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文献综述的目的是寻找已有研究的缺陷与不足,学术争鸣的目的更在于通过挑战与辩护来发现彼此研究的缺陷,找到改进和发展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相互探讨和争论,不仅是繁荣议题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径,更是学者们相互帮助、促进彼此水平共同提高的重要途径。只有相互争鸣,彼此鞭策,才能营造追求卓越、追求完美的学术风尚。

四、总结

过去四年,中国理论研究的范式取向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尽管传统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依然是相对关注最多的范式,但没有任何一种范式居于主导地位。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理论探索的多元化有利于塑造学者们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同时使得不同的理论思想都能在相互碰撞中接受检验、批判并不断完善。在认识论方面,中国学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共识,实证主义为绝大多数研究理论问题的中国学者所接受或支持。在研究方法方面,文献解读和历史描述依然是使用最普遍的方法,只有很少数学者能熟练地驾驭统计分析和形式模型这样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① 刘丰 《以议题为导向实现学科创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23日,第15版。

中国学界在范式和认识论上的情况与美国学界十分接近,唯独在方法论上,中美两国学者各自最常使用的方法恰好都是对方使用最少的方法,再联系到中美两国国际关系学术水平的差距,越发凸显出研究方法方面的落后是导致中国理论研究水平落后的核心性原因。中国研究理论的绝大部分学者都接受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这意味着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之所以在中国理论研究领域的普及率低,并不是因为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真的在科学哲学层面上反对实证主义和科学方法,而是由于他们对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不熟悉。

过去四年中国理论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相对而言,古代中国思想与东亚历史经验、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规范、中国学派、同盟理论、规范性理论、国内政治与国家行为(新古典现实主义)、战争相关问题以及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和语言等 11 个议题讨论最为集中。其中,有关古代中国思想与东亚历史经验的讨论和研究最为热烈,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所独有的热门议题。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学者对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突破的强烈渴望,更反映出当前这一时期一部分中国学者已经开始从单纯的“喊口号”进步到着手实际的文献发掘和阐释工作。

借鉴中国传统智慧和历史经验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 innovation。学者们在满怀激情地钻研历史典籍的同时,不应遗忘或者偏离这个初衷。理论创新的核心指标是创造出解释力大于旧理论的新理论。这就要求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不能满足于仅仅对古代思想和古代历史作出梳理和诠释,而应以此为基础,努力创造出既能很好地解释古代中国和东亚的国际关系现象,又能解释近现代国际关系现象的新理论。所创造的新理论最好不仅能回答古代中国的决策者所面临的问题,更能对当代学者和决策者所关心的问题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解释和处方。

理论创新的整体水平与过去相比未能有明显的提升,但仍然涌现出不少具有相当水准的创新成果,反映了中国学者在创新道路上所做的努力。特别是在过去四年出现了宏观层次的原创性理论,这或许标志着中国理论

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除此之外，中国学者在传统安全问题、国际规范的传播和演化以及国际制度与国家的相互作用等多个领域都有知识上的贡献。从那些优秀的创新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敏锐的问题意识、广博的知识视野、扎实的逻辑和实证能力，是作出原创性理论研究的必备条件。学者提高这三方面的素养，有助于作出好的理论创新研究。

与创新成果相比，非创新成果仍是过去四年中国理论研究的主流，梳理型、口号型的论文仍然充斥于中国最优秀的国际关系学术期刊。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固然源于研究方法薄弱、问题意识欠缺等痼疾，但也与中国学者实干精神的缺乏密切相关。很多学者在提出好的构想或者“议程”之后，常常不愿为实施这一构想或议程而付出实际的努力。相比较于详细扎实的文献梳理，以及各种美好的构想和热心的建议来说，中国当前的理论研究最为稀缺的是学者们尖锐犀利、睿智奇崛的智慧迸发和说干就干、只争朝夕的雷厉风行。为了培养崇尚实干的学术风气，国内主要学术期刊可考虑超越现有的选稿标准，从看重文章篇幅长度和注释详细程度，升级为对其科研实践程度和知识贡献程度的考察。

作者简介

邓子立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2010年在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获法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dengzili2008@sina.com

王翠文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2002年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获史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cuiwen@nankai.edu.cn

徐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2008年在清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xuj@cass.org.cn

杨原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2010级博士生。2010年7月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获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 yyir@163.com

江忆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 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国际关系和历史学士,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硕士, 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专著有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等。

电子信箱: johnston@fas.harvard.edu

威廉·卡拉汉 (William Callahan)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系教授。专著有 *China: The Pessimist Nation*;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Resistance in Pacific Asia*; *Contingent States: Greater China and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等。

电子信箱: callahan@manchester.ac.uk

卡宁汉-克洛斯 (Lindsay Cunningham-Cross)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候选人。

电子信箱: linsaydc@aol.com